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 成长如蜕——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高小弘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 成长如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高小弘 著



YZLI0890113461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如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高小弘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09957-6

I. ①成… II. ①高…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160 号

成长如蜕

CHENGZHANG RUTUI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高小弘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43 千字 印数:0,001~2,200 册

ISBN 978-7-01-009957-6 定价:34.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

## 编委会

顾问 刘则渊

主编 洪晓楠

副主编 王 前 丁 埜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埜 文成伟 王子彦 王 前

王国豫 王续琨 刘乃仲 刘元芳

刘艺工 刘鸿鹤 张志刚 张学昕

杨连生 迟景明 郑保章 姜青春

洪晓楠 费艳颖 蔡小慎

本书由

- 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 教育部“985”三期“科技、人文与社会发展研究创新平台”基金资助

本书系

- 大连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二十世纪文学创作中的性别意识与和谐社会的文化构建”(项目批准号是DUT11RW406)的阶段性成果

## 《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总序

科学和人文是一对孪生兄妹,两者可以说是“相融是利,相离则是‘半个人’”(杨叔子语)。

英文的 science 一词基本上指 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 science 来自拉丁文 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 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 scientia 类似,含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从静态的观点看科学是一种认识成果,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前,科学是小规模的运动,主要是少数学者和哲人的个人活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相继建立了一批大学和科学院。尤其 19 世纪以后,科学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展,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才迅速发展。到现在,科学活动不再是少数人进行的纯学术研究,而是由众多社会成员参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科学研究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事业、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如今运用动态的观点把它看作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认识世界的一种过程,生产科学知识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能使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帮助人类提高认识能力,同时人的认识世界的预测能力更是全面提高,突出人的主体性,表现了科学认识的能动性。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它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一种高尚的文化成就。早在 17~18 世纪,科

学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被纳入整个文化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功能。到了19世纪中期,科学文化更是蓬勃发展,在某些人心目中,科学文化简直是文化的典范,代表着文化的未来。如今,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社会,科学文化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过程。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汇,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而且科学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政治、民族的精神状态和文化传统。

英文的 Humanities 直接来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而拉丁文 Humanitas 继承了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 Humanitas 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 Humanitas 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 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 humanitas 以希腊文 paideia 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sup>①</sup>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sup>①</sup> 参见吴国盛:《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人文学科一词来源于公元前 55 年,西塞罗在其《论雄辩家》一书中首先把 *humanities*(人之品质)列为辩论者的一项基本训练项目。后来经过希腊罗马修辞学学者的发挥,*humanitas* 就成了古典文科教育的基本大纲。再往后,由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教父们使之转为基督教服务,它又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徒的基础教育,构成了称之为 *artes, bone artes*(“通艺”)或 *artes liberales*(“自由艺术”)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数学技艺和语言艺术,也包括某些科学,历史学以及哲学。欧洲十五六世纪时期开始使用此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仿照美国体制分为 3 个学院,其中的文学院教授的就是人文学,简称文科,以别于教授自然科学的理学院和教授社会学的法学院。

科学与人文都是社会文化现象,所以对它们的考察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系统去孤立分析。科学与人文本来是统一的。在古希腊时代至欧洲中世纪科学和人文皆被包含于哲学之中,是处于一种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状态之中,当然,这种浑然未分的统一是由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皆未分化的结果。近代以后,当人文学科从中世纪的神学解放出来,尤其是科学真正意义上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时,科学与人文真正走向独立。此阶段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双向互动的主要特征,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机制;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相互对立,彼此竞争的互斥机制。人文运动把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人文主义的传播。用理性来对抗神学迷信,就是这一阶段科学与人文携手共进的重要目的之一。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在西方已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或学说了,它已是建制化的活动,已是最有权威性的实践。到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成为主旋律,几乎占领了整个知识领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相信只要掌握了科学就能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另外科学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愈来愈大,成为推动社会系统进步的主要力量,从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把自然科学绝对化,产生

了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观,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经验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即实证的。科学几乎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即“判定什么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科学主义的诞生不仅否定了宗教权威,而且动摇了以人的感性经验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人文知识体系。而这一时期人文精神对社会的影响日渐消退。科学与人文之间表现出逐渐分离的趋势。人文固守绝对价值目标,忽视通往这一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

近代以来,科学探索与人文探索关注事物的角度、它们的知识系统、文化思维、问题域和观念系统等等不同,科学和人文处于分化,对峙状态,甚趋于紧张。另一原因是人为原因,这就是受现实的功利价值、经济效益趋使。在现代社会,随着实证科学和近代技术的兴起,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角色转换。由于社会制度的作用,自然界开始变成被人们操纵的对象和被人们利用的工具,人本身变成了中心。科学作为工具价值的一面和作为目的的价值的一面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致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科学的异化现象,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把当代人类推向了严重的生存困境。科学成了统治人的外部强制力量,这种状况,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不是对科学本身的异己性进行批判,而是对科学本身进行拒斥,用人文世界拒斥科学世界,从根本上否定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并用艺术精神和非理性主义来取而代之;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思想家则把科学的人文价值从科学的价值中剥离出来,把科学理解为与人生存的意义完全无关的关于纯粹事实的科学,并进而用科学世界拒斥人文世界,科学与人文截然割裂。科学主义者突出强调的是科学和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用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来审视别文化,忽视或贬低人文文化的意义和价值;而人本主义者则突出强调艺术和非理性的重要性,强调要以“人”为本来审视一切文化,排斥和否定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于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便进一步加深了。19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的分野进行表述的,是标榜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历史学派传人李

凯尔特,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自然科学与历史的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对立。

自从实证主义产生之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别日益明显。实证主义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严格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提出了分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兹后这一问题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被科学哲学家们广泛而激烈地争论。从总体上来看,自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家们大都在论证两种文化的独特性,给它们划界。实际上,这无意中加深了两种文化的裂痕。自20世纪中叶之后,思想家们大多从揭露两种文化的分化的弊端出发,寻求弥合两种文化裂痕的途径和方式。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者同狭隘的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无法看到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人本主义者只看到科学技术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直接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因而看不到科学技术同人的生存、栖居、自由和发展的深刻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近代人文主义运动在近代前期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近代后期,由于科学自身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功利主义的应用,造成了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排斥,相互分离。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科学主义的悲剧还是悲观的科学虚无主义的误区,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离开了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所致。

从整个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的教育都十分重视人的素质的培养。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人文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中国在19世纪后期开始学习西方,发展专业技术教育。在20世纪专业技术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深受原苏联的影响,文理分家,理工分校,专业面狭窄。我国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法、经、社、农、医、工程

等主要学科中,理工科比例太大,造成畸形发展。人们在思想上重工轻农,重理轻文,重“硬科学”轻“软科学”,即便在文科中,人们又存在着重社会科学轻人文学科的倾向。

当前,对于理工科大学生来说,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尤其重要;对于文科大学生来讲,提高科学素养也是当务之急的问题。通过近十几年来的努力,人们已经逐渐形成了“大”文化素质教育观。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要相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要相融,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要相融。相融则利,相离则弊。科学素质、科学精神,人文素质、人文精神就是在科学知识、人文知识中形而下的东西,经过人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人的实践,在实践中深思,在实践中体悟,在实践中磨炼,内化升华,形成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精神就是人文的东西,所以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的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就是应以“实事求是”作为其基础的求善精神,从这一角度讲,就是求善的科学精神。科学与人文都有共同的追求。科学追求真,人文追求善,两者结合,保证追求正确,保证结果可以完美。这就是追求真善美高度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真善美都是围绕着要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的明天。一个正确的思想,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必定是逻辑思维同形象思维、科学技术思维跟人文艺术思维的高度的统一。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自1999年成立以来,学院的发展得到了学校领导以及学界同仁、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经过10年的努力,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基本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教学上,由以“两课”为主的教学工作向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导、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教育快速发展模式的转变;在人才培养上,由专本科和短期培训为主向本科生、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由教学主导型向学科建设为基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重的模式转变。目前,随着学科快速发展的需要,学校在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中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正在按照“文理渗透、中西融汇、学研一体、博专结合”的理念,努力形成以文理工

管交叉渗透为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

2006年大连理工大学决定设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07年就拿出112万专款用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决定以后每年拿出100万元作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这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2009年学校又提出文科要入主流,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期待,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理所当然地要一马当先,提升我们的学科水平。基于此,我们在编辑出版“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的同时,结合我们学院学科较多、覆盖面宽、涉及面广的特点,本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人文”的宗旨,编辑出版“科学与人文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套跨越科学与人文两个研究领域的综合性丛书,具有基础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综合性的特点,内容主要涵盖科学与人文综合研究的诸多方面。举凡涉及科学、人文及其关系的内容,均收入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是我校“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项目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中的著作或者是我们学院部分教师承担的各级各类研究课题的成果,或者是来自名校的年轻博士的博士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持续不断的出版和若干年的努力,不仅进一步搞好我们的学科建设,形成我们的学科特色,而且为实现“文理渗透、中西融汇”,促进我国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

洪晓楠

2009年8月8日于大连

## 新的话题 新的言说(代序言)

傅书华

在近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论著中,高小弘的《成长如蜕》是一部颇值得给以认真阅读与重视的著作,其所提出的新的话题及对此的新的言说之处多多,并由此给了我们提出新的话题发表新的言说以广阔的空间,我虽然不是女性文学研究的业内人士,但我想以我对这本书的言说,引发大家对这本书的兴趣及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我想先谈谈我对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的理解,这三个关键词分别是:90年代,女性,成长。这是三个有着内在深层关联的关键词,其内在的深层关联又构成了历史内容与价值形态的张力,从而给我们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虽然许多论者将“新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文学阶段而试图给以某种“史性”言说,且不乏其鲜明性,但我觉得,90年代,在中国文学史的代际划分中,是一个实质性的分界线。中国社会形态在自身的历史性运转中,在这一时期不以人的意志出现了根本性的断裂与变化——特殊的历史事件,只是其中的外在性表征,且只是这种外在性表征中的一个。所谓断裂与变化,是说中国社会在其历史运行中,从此在其社会根基处,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并因为其根基处的变化,而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处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如果说,作为中国历史一个新的起跑线的五四时代,就体现了这种变化的端倪,但其表征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思想层面,那么,90年代的变化,则是根本性的整体性的。且涉及到

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生存及日常生活之中了。

面对这种变化,中国的思想界、学界,主流的以及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全体民众的精神形态,都相应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动荡,众语喧哗,莫衷一是: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学热或曰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深入批判等等,均是这其中比较响亮的声音。如果说,自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之中,那么,自鸦片战争之始,中国社会在这一超稳定社会结构崩溃之后,就处于一个层层蜕变的成长过程之中,漂泊的宿命,青春的激情与反叛,悲凉之感等等,这些关键词频频地出现在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进程之中,成为中国社会甚至每一个社会成员成长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新的社会形态还没有成熟,只要现代人的的人生价值指向还没有明确,我们就注定还只能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而90年代,则是这一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节点。那么,在这样的成长节点中,又是什么会成为这一成长节点中新出现的关键词呢?

新出现的关键词或许会有几个,但女性却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

简略或粗疏地说,我们可以说,男性更多地体现着社会现实法则及其合理性,女性则更多地体现着个体生命法则及其鲜活性,社会现实法则建立的基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个体生命法则建立的基础则是个体生命欲求的丰富、深刻、细腻等等。如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进步的尺度,要看社会现实法则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吻合个体生命法则。所以,不是从性别解放的意义上,而是从人的解放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女性解放的程度,标志着人的解放的程度。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上述两种法则的落差中,男性的价值尺度,总是处于中心的的主流的位置,女性的价值尺度,总是处于边缘的前沿的位置。但也正因此,一个时代的最初的变化征兆,我们往往可以在女性的命运、追求中得以看到;但也正因此,女性在价值形态上,而不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上,更具备了路标性意义。

始自 90 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型中,人,特别是作为个体的人、个体性、个体利益、生命欲望、物质享受、日常生活、个体的现实价值实现、情感性、瞬间性等等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并构成了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价值形态的挑战性、动荡性,而所有这些,无不与女性的性别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般的亲和性,由此,中国的女性意识,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并形成了女性的性别热潮,其直接的表述形式,就是女性文学热潮的形成。这是因为女性意识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性符码系统时,在无法借用原有的男性的理性符码系统表述时,在最初的生命感性经验无法上升为理性语言时,感性的形象的文学语言,就成为她们最好的写作方式与表达方式。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 90 年代以来,女性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道极为炫目的风景。

在这道女性文学写作风景中,女性成长小说有着其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对女性成长的重新审视,也是通过对女性成长的重新审视,来探寻一种新的个体生命形态、法则的形成、成长过程及在这一过程中,与原有的社会结构、价值法则的紧张关系,来表达一种对人与社会其实质是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全新理解。

那么,90 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具体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我们上面言说的内容呢?非常遗憾的是,与 90 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的繁荣相比,对 90 年代女性成长小说研究的著作却寥若晨星,而高小弘的这本《成长如蛻》则是这晨星中闪闪发亮的一颗。循着作者的论述,我们得以一窥 90 年代中国女性成长小说的全貌,并藉此探究蕴含于其中的我们前面所言说的内容,而高小弘作为青年女性,作为女性文学研究者对此的言说,又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另一个维度——成长中的青年女性的维度,所有这些,正是引起我们阅读高小弘这本《成长如蛻》的兴味所在。

或许因为我是男性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接受了过多的既往的社会现实法则、价值形态,总之,我在阅读本书时,时时地有着一种新鲜的刺激感,有着一种被挑战感,我想,正是这种感觉,构成了两种价值法则、形态的张力与对话的意义。下面,我例举二三,来谈谈这种感觉,来开展这种对话。

第一,对女性成长小说特质、形态把握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清醒与自觉。我在阅读女性成长小说时,常常会有一种特别的体会,就是当我们用所习惯的人的成长(其实是男人的成长)用人在与旧的社会形态冲突,在对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追求中的成长来分析女性主人公的成长时,总是会在分析完之后,又觉得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所没有能够用语言表述出来的,有着一一种只可体会而无法言传的东西在里面。这种阅读感受是我们阅读《家》《财主的儿女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等男性成长小说中所没有的。特别明显的例子,比如说丁玲的《在医院中》杨沫的《青春之歌》。就拿《青春之歌》来说吧,你尽可以说这部作品写了革命、父权对女性的征服、同化与引领,但在作品中,又总是有着一一种独特的味道、神韵,是你用这种解释所无法概括的。这也正是这部作品无论在“十七年”还是在今天,总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原因之所在。因之,当我读到高小弘下面这段话时,我是十分认同的:“女性写作者则会时常陷入了两种话语类型的窘境中:一种是支持性别统治的话语倾向,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表达;另一种是坚持女性真实体验的反性别统治话语倾向,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反抗和消解。这种语言窘境直接会产生出一种认同与质疑、抵抗与服从杂糅的创作心理,因此,女性成长叙事的审美效果就呈现出晦暗不清、枝蔓丛生的特点,而这种叙事效果本身也隐喻了女性成长历程的复杂性与艰难性。”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女性成长叙事中的这种“晦暗不清、枝蔓丛生”这种“复杂性与艰难性”与女性经验无法用既有的话语符码给以“言说”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本书中关于家、父女关系、母女关系的论述读来让人深有兴趣。

自从《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束,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起点,将“家”、将从“家”“出走”作为原型推出之后,关于“家”关于从“家”“出走”的故事,相应地,父子关系、弑父与从父的故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就被反复讲述,层出不穷。但高小弘却更重视的是,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是如何“摆脱了长久以来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家’的种种遮蔽,还原出‘家’在女性成长过程中深刻真实的本相”;却更重视的

是,被父子关系这一强大阴影所遮蔽的父女关系的真相是什么,并对此作出了清晰的梳理。作者认为:女性对伦理意义的“家庭”神话的坍塌与对具有彼岸价值和人文主义理想的“家园”的憧憬是同时并存的,女性的“恋父”情结与“审父”心理是同时并存的。在我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个体生命法则与社会现实法则二者之间张力的必然结果。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对母女关系的论述及在这论述中对母性神话的“去蔽”,这一“去蔽”是通过对母亲欲望情感的发现、通过对专制母爱的揭示来完成的。在我看来,中国传统中的母性神话更多地强调的是母亲的伦理角色及对这一角色的神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至善的结晶体。高小弘所论述的女儿对母亲欲望情感的发现,使母亲这一角色,从伦理价值本位转换到了个体生命价值本位;其对专制母爱的揭示,则打破了民族传统文化中,以主观美好的伦理意愿代替客观真实存在的意象造型观的审美定势,是对直面现实的五四文化精神的深化与细化。这两点,都是今天中国以人为本,将人从天上回归现实大地重建人的乐园的时代特征的鲜明表征与炫目体现。

### 第三,身体话语。

无论是古代还是在今天,中国一直是一个身体失语的国度。在久远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存天理灭人欲一直是主导力量占据着主导地位。于是,在男女情事中,或者美好的男女情感只出现在婚前而与身体无涉,或者因为身体的介入,而使男女情感流于下作。情与欲的对立、隔绝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常态。身体的其他需求、享受,亦一直与美德无缘。及至近现代以来,由于缺乏健全的身体的话语资源,作为人的解放之前驱的身体觉醒,或者以无序的躁乱、扭曲的形态出现,如郁达夫的《沉沦》之类,或者轻而易举地被新的社会话语所泯灭所收编。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中,身体在如何实现过程中的失范,一直是社会价值动荡的主要表征之一,在这其中,女性的身体又成为最为敏感的中心话题。因之,我在阅读本书中,特别留意90年代的女性成长小说及本书作者对此作了怎样叙述。

本书作者对五四以来的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身体叙事的高度概括虽